

●中青年经济学家眼中的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

主编 国世平 易昌泰 龚文密

·回顾
·评估
·展望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89187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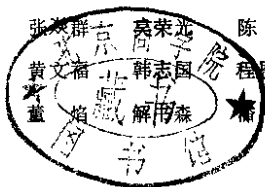
● 回 顾 ● 评 估 ● 展 望

——中青年经济学家眼中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

主 编：国世平 易昌泰 龚文密

本书撰稿者（按姓氏笔划排列）

王绎频	刘国强	李 萍	李克华	许经勇
许建国	国世平	国 庆	郁 方	易昌泰
张中华	张群	荣光	陈 冰	荣光新
郭代模	黄文福	韩志国	程恩富	龚文密



F121.29

18918724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回顾·评估·展望

主编 何世平 易昌泰 龚文密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展览馆路3号)

长沙市东风印刷厂印刷

1988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11.375 字数: 287,000

印数: 1—5,000

ISBN 7-5357-0543-X

F·59 定价: 4.50元

改革与中国经济学的前景

——代 序 言

厉 以 宁

一

中国经济正处于从旧的体制转入新的体制的更革时期。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以一种不可阻挡的势头蓬勃发展。僵化的经济体制已经被冲破，生产力获得了新的解放。因此，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不可能停留在现有的水平上。正如生产力的发展对僵化的经济体制进行了有力的冲击一样，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也必须对束缚人们思想的旧观点、旧学说、旧理论模式进行有力的冲击。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提出新论点，这是时代对我们的要求。我们再也不能以经院式的态度来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了。把经典著作中的个别公式和个别结论奉为永远不换的教条，并以此来禁锢我们的思想，束缚我们的手脚，这决不是维护马克思主义，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

在研究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我们也经常看到一些好心肠的同志，他们想研究新问题，但总想从经典著作中寻找出处，寻找答案，以为只要有了出处，胆子就大了，说话时腰杆子也硬一些，以为这样就给自己找到了护身符，找到了保护伞。比如说，讲社会主义宏观经济调节，他们就说：《资本论》中讲过政府可以实行宏观调节，宏观调节有这种或那种好处；讲开放资金市场，他们说：《资本论》中已经讲过债券和股票的发行对发展经济的作用。他们确实是好心肠的，他们总想给经济体制改革的每一项措施找到出处。其实，这是不必要的。难道没有出处，我们就什么也干不成了吗？没有出处，我们在研究中就迈不开步子吗？要知道，有出处也好，没有出处也好，我们不去牵强附会，一切以实

践为原则。马克思主义需要有新的发展，经典著作中的个别论断要重新经受实践的检验，当代中国经济学所走的是--条新路：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创造性研究的道路。中国经济学界的历史使命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发展马克思主义，把理论研究提高到新的水平，创建我们自己的、科学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并使它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真正起到指导作用。

在谈到中国经济学的前景时，很重要的一点是经济学研究必须从国情出发。正如目前进行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教育首先是进行国情教育一样，目前经济学研究的重点也首先是国情研究。国情教育是指对我国社会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国情研究也是指对我国社会现阶段的经济特征、经济中的矛盾、经济运动的规律性以及经济的变化趋势等进行科学的研究。建国30年来，也就是在1978年以前，我国经济学界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并不明确，总是把发展生产力看得很简单，以为过渡到共产主义不是遥远的事情，从根本上说，就是脱离了中国国情进行研究。只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济学界才开始从本本主义束缚下解放出来，把眼光投向实际，才认识到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1979年以来经济学界的这一转变的意义不可低估。但即使如此，我们应当看到“左”的积习仍然很深，“左”的影响仍然是巨大的。那些好心肠的、总想在经典著作中为当前的经济体制措施找到出处的同志们，在某种程度上依旧是受到“左”的思想的束缚，或者，至少是被“左”的一套吓怕了，从而忘记了对国情的认识、对国情的研究要比引述经典著作中的不符合实际的个别论断重要得不可比拟。从这个意义上说，认识国情、研究国情与思想解放是完全一致的。唯有解放思想，才能认识国情，研究国情；也唯有对国情有正确的认识，对国情有科学的研究，思想才能进一步解放。

二

对国情的认识和对国情的科学研究，对经济学界来说是必要的。但仅有这些，还远远不够。每一个经济学工作者都会遇到这样

一个问题，即怎样对待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之间的关系？毫无疑问，经济学工作者需要研究经济政策问题，但他们不能只限于经济政策的研究，尤其不能把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狭隘地理解为对现行经济政策的解释。如果这样理解，那就大错特错了。难道经济理论只是跟在现行经济政策的后面，变为对现行经济政策作解释的学问吗？这不是不仅限制了经济学的发展，而且意味着取消经济理论研究吗？我们常常说，经济理论研究要走在实践的前面。如果经济学工作者只是对现行经济政策作解释，那么理论研究又怎能走在实践前面呢？

一部经济学史清楚地表明，任何一个时代的经济学家，如果要作出成绩来，都需要端正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的关系。他只有不把自己的任务局限于对现行经济政策的解释，才能在研究中有突破，才能取得理论研究的新进展。经济政策产生于经济理论，而绝不能颠倒过来，把经济理论看成是经济政策的附属物。我想，这一点对于当前中国的经济学界特别重要。应当明确：不是让经济政策的制定部门和执行部门来决定经济学工作者的研究和观点，而是让经济学工作者用自己的新的研究成果来影响经济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不仅如此，经济学界除了应当知道经济部门当前正在考虑什么，正在着手制定什么样的政策以外，更应当知道经济部门忽略了什么，没有考虑到什么。这就是说，即使以政策研究来说，经济学界应当“想政府之所未想，急政府之所未急”。显然，那些仅仅把解释现行经济政策作为自己的任务的经济学工作者，是不会、甚至不敢进行这方面的研究的。

由此看来，经济学界面临的任务的确是重大的。他们一要脚踏实地，从国情出发，二要解放思想，勇于探索新问题。只有脚踏实地，才能纠正超越阶段的空想论，才能在研究中既不受经典著作个别论断的束缚，又不受现行经济政策的限制。经济学史告诉我们：每一个时代总会出现站在时代科学研究前沿的经济学家。但不管怎样，能在经济学研究中作出巨大贡献的，必定是研究本国现实经济问题的人。立足于本国，立足于现实，才能在经

济学研究中真正有所突破，有所创新。历史不正是如此么？哪一个著名的经济学家是对本国的现实经济问题缺乏研究的人？哪一个著名的经济学家只会解释本国政府的现行经济政策？

让我们再回到中国经济现实问题上来。试问，今天谁最了解中国经济？谁最了解中国经济建设中的现实问题？正是我们这些亲自感受过“文化大革命”灾难的人，是亲自体验过“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究竟是什么滋味的人，是亲自体验到这几年来政策变化所带来的社会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提高的人。因此，对中国经济究竟如何评价，我们最有发言权。就以今天三十多岁的青年经济学工作者来说，他们上过山，下过乡，插过队，当过兵，已经懂得什么是饥饿。他们开始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时候，就知道什么是“最动听但又是最无意义的大话、废话、空话、谎话”。他们在着手研究经济问题的过程中，终于体会到真正阻碍中国经济进步的原来就是那些本来不属于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而是被附加上去的貌似社会主义的僵化模式。所以说，他们今天在研究中的每一项成就，都来源于他们立足的中国现实生活之中。我有一些学生正在国外留学。我反复叮嘱他们说：你们在国外可以学习很多新知识、新方法，但要记住，如果你们想在经济学方面做出重大的成绩，必须深入到中国的实际。中国的经济学工作者唯有牢牢扎根在中国经济这块土壤上，才能根深叶茂，结出丰硕的果实。不然的话，你留学回来，可以开一门新课，当一个好教员，你可以讲授某种新的方法，也可以培养一些人。但是你要想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并作出成绩的话，那么你必须深入中国的实际，深入社会，了解现实。也就是说，问你：想不想将来走在中国经济学的前沿？如果不了解中国实际，你怎么走在前沿？

三

经济学工作者在探讨现实问题的过程中，有责任对传统的学说提出挑战，并提出自己的新观点。但新观点一开始通常被看成是异端，被当作标新立异。为此，他们就有可能遭到非难。这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从经济学说史上看，从来都是如此。一部经

济学说史未尝不可以被看成是各种“异端”学说出现的历史，也就是各种新观点替代旧观点或试图替代旧观点的历史。新观点固然一开始被当做异端，但它的真正命运取决于它以后能不能经得起实践的检验。经不起实践检验的异端学说，很快就会烟消云散，成为经济学说史上的匆匆过客，而经得起实践检验的异端学说就能保存下来，并会逐步从异端变成主流。实际上，经济学中的一切论点，在他们刚被提出时，都可以看成是一种假设。有的假设只是经济学说史上的一个小小的插曲，有的假设后来却发展为一个完整的学说体系。假设而没有经过验证，它始终只是一种假设而已。经济学总是在不断地假设和不断地验证之中前进的。社会主义经济学不会例外。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研究也不例外。

在这里，我们不妨以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为例。新观点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判断收入分配的要点是，首先看它是不是合法收入，而不是看它是否劳动收入。即使是非劳动收入，但只要是合法的，那就可以存在。但在这样的观点刚出现时，却被认为是非正统的，从而受到了责难。事实上，通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讨论和近年来经济实践的证明，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对于一种社会中的分配制度不能单单地从道德标准去判断，而要从是否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角度去判断。在目前条件下，允许通过私人资产选择、生产经营和市场竞争取得一定收入，以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不能追求单一的按劳分配形式。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格局，适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商品经济的要求。这是我国的改革实践和改革理论在收入分配领域的重要发展。这与在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上，逐步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并不矛盾。

也许有人会问，在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中，一种新观点的产生，一种新学说的形成和发展，究竟归于谁呢？应当说，经济学的创新所依靠的是集体的智慧，它们是集体智慧的成果。只有在争鸣的学术环境中，集体的智慧才能充分发挥出来。经济学研究

中，每一种新的学说的条理化、理论化、规范化，都不是个别人实现的，也不是个别人能够完成的。任何一个研究者，不管他的思想多么敏锐，学识多么丰富，他要作出成绩，总离不开前人在这个领域或附近的领域内的研究工作，也都离不开同时代人在各方面对他的直接或间接的启发和帮助。任何一个经济学问题，总是经过多次讨论，多次学术观点交锋，才终于接近解决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大家全都参加了经济学界的争鸣，全都为经济学的创新贡献了自己微薄的力量。谁是经济学的创新者？是包括所有关心中国经济建设的人在内的成千上万普通的经济学工作者和实际经济工作者。经济学创新归功于集体智慧的最明显的证据之一，就是关于社会主义计划与市场之间的关系的新理论的提出。

长期以来，流行于经济学界的有关社会主义计划与市场之间关系的传统观点是“板块理论”，即认为计划与市场各管一块，并且计划管的是一大块，市场管的是一小块。但近几年来，通过广泛的调查、研究、总结，通过无数篇论文、调查资料、研究报告，这才逐渐明确了计划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内在的、统一的关系，即应该形成如下的格局：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企业之间的经济关系和政策计划工作都建立在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企业根据市场供求状况，调整自己的经济行为，政府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调节市场，再通过市场来引导企业生产经营。也就是说，政府应该通过政策措施的实施，有计划地利用市场机制，把计划和市场有机地结合起来。这不但保证了宏观经济稳定，而且也增加了企业的活力。能够把社会主义计划与市场之间关系的新理论的形成归功于任何一位经济学家么？能够把这一理论上的创新说成是某某经济学家在某一本书中的研究成果么？这样的归功是没有意义的，而且任何一个经济学家都消受不了这份荣誉。我们只能认为，每一个曾经在这个研究领域内投下了劳动的经济学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都为这一理论的创新出了力。事实正是如此，谁也不能否认这一点。

回顾几年来的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回顾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发展，正如我们对经济体制改革的前景充满着希望一样，我们对中国经济学的前景也充满了希望。在破除旧的经济观点的影响方面，“多米诺骨牌效应”已经开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建立，生产力作为检验经济学说的标准这一原则的确定，社会主义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性的新学说的形成，这一切使得原来的僵化体制赖以存在的传统经济理论失去了依托。可以设想，在财政学、货币银行学、部门经济学等领域内，都将产生一场新观点代替旧观点的变革。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创新是全面的，它不会被局限在个别领域内。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创新好比一条长河，但它并没有尽头。

再从学科之间的横向联系来看，经济学同其他科学基本是同步发展。目前，不同学科的交叉和渗透，正在以越来越快的速度进行。在经济学和其他学科的边缘地带，已出现并正在出现一个又一个新的学科。经济学工作者要关心其他学科的最新进展，注意吸收其他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更重要的是，要设法在经济学同其他学科的边缘地带进行探索，开辟一条条新的研究途径。因此，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创新同新的边缘学科的建立之间存在着这样一种关系：新的边缘学科的建立及其研究成果的提出将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创新，而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创新又会促使这些新的边缘学科的研究日益深入，促使它们涌现出更多的研究成果。

可以肯定，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可以预见到社会主义经济学广泛领域内新观点对旧观点的冲击和替代，经济学同有关的一系列新的边缘学科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各个新的边缘学科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这将是中国经济学创新的高潮。我们正在迎接这个高潮的来临。但不要忘记，经济学的发展固然需要良好的学术环境，更需要经济学工作者们坚持不懈的努力。良好的学术环境正在形成。通过对党的十三大文件的学习，广大经济学工作者对此已充满充沛的信心。于是就要看经济学工作者自己是不是努力了。有了

良好的学术环境，不等于有了一切。唯有依靠经济学工作者在研究中的认真、勤奋、刻苦，经济学创新的高潮才能成为现实。

企业经营中的创新有赖于企业界创新精神的激起。经济学创新同样有赖于经济学界创新精神的焕发。创新是需要激情的。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广大经济学工作者满怀巨大的希望，对于蓬勃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广大经济学工作者从一开始就满腔热情地予以支持，因为大家都意识到，自己与改革共命运。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经济学界正在以自己的创新精神去开创经济学的光辉前景。这是我们大家都引以自豪的事情。

五

前面曾经指出，中国新经济学的成长与新一代经济学工作者的成长是分不开的。新一代经济学工作者的成长有一定的条件。除了他们对于近些年来中国经济的变化有切身的体会，并且能够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探讨中加深对经济问题的认识以外，他们本身的知识结构也是有利于自己成长的条件之一。不言而喻，每一代人都有自己那个时代造成的知识结构方面的局限性。由于知识结构的变化是不间断的，所以新一代经济学工作者完全有可能发现老一代经济学工作者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并且终于在某些方面实现突破，取得成绩，超过老一代经济学工作者。经济学正是这样走向新的境界的。新一代的经济学工作者如果不能超过老一代经济学工作者，经济学又怎么能发展？新一代的经济学工作者如果一开始就没有这种决心，没有这种抱负，没有作出新成绩去超过老一代的愿望，那么经济研究本身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如果要较具体地解释一下，究竟什么是中国的新经济学？那么，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它是从中国国情出发，理论联系实践，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提到新水平的经济学。中国的新经济学之所以是新的，是指它在新的经济学说、新的思维方式、新的研究手段这三方面的统一。假定经济学工作者的观点是陈旧的、思维方式是僵化的，又不会使用新的研究手段，只知道从经典著作中找出处，引语录，那么他们

肯定与新经济学无缘。

一个很能令人深思的现象是：那些坚持过时观点的经济学家往往自认为最有学问，把一切有新的经济学观点，有新思维方式以及经常运用新的经济学研究手段的经济学工作者视为缺乏“功底的”、“没有学问的”等等。于是一切都颠倒过来了。只知道引述前人所说过的话，不知道中国的经济实际情况的人，被自封为有学问；从中国国情出发，深入社会，根据实际情况而提出经济学新观点的人，被视为没有学问。这岂不是怪事么？但时间是最公正的裁判者，时间对经济学工作者的评价标准，决不会象这些人对于经济学界的评价标准那样。也许，还用不着让历史来判断。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现实已经作出了判断，广大青年读者的心目中也早已作出了判断。这就是经济学研究能够不断取得进展，不断出现新的突破的原因之一。

广大的读者是殷切地希望某些持有过时的经济学观点的经济学家转变自己的看法的。经济学界也普遍有这种希望。经济学界在一些大的经济问题上逐渐取得比较一致的、符合实际的观点，将有助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和经济学的发展。但经济学史上不止一次地告诉后人，经济学界总有少数始终坚持过时的观点的经济学家。要过时的经济学家放弃过时的经济学观点，是非常不容易的。这有各种各样的原因。而且各人情况不同，影响不同人的主要因素也不一样。但在所有各种原因中，也许有一个很容易被人们忽略的、但并不是最不重要的原因，这就是：有些过时的经济学家自认为是“最有学问的”，如果他们一旦承认自己的观点过时了，岂不是等于承认自己不象过去自封的那样有学问了。越是过时的经济学家，越害怕被人们说成是没有学问的。他们越是害怕被人们看做没有学问，他们就越要坚持过了时的经济学观点，把无理说成有理，把有理说成无理。但时间毕竟是最无情的。坚持过时的观点的经济学家渐渐感觉到：自己写的文章，没有多少人爱看了；去做学术报告，听的人不那么讲礼貌，报告才做了一半，人就走得差不多了；在理论座谈会上作长篇发言，

但有人似听非听，有人窃窃私语，有人打睡瞌，有人看报纸，有人递上条子，请他简短些，或者有人站出来打断发言，提些本来很容易回答，但又回答不出来的问题。变了，变了，一切都变了。但他们不会承认自己所坚持的是过了时的旧观点，也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他们留恋过去那种由自己的影响支配着经济学界的学术气氛。尽管那是一种极不正常的学术气氛，但那个时候之所以值得留恋，因为它是过时的经济学家地地道道的“黄金时代”。

新经济学在成长。新一代的经济学工作者在成长。少数坚持过了时的观点的经济学家，他们著书，写文章，让他们去写吧；他们演讲，作报告，让他们去做吧。只要读他们的作品的人越来越少，对他们的报告感兴趣的人越来越少，他们在中国经济学界的影响不就越越来越小了吗？正如谁都阻碍不了改革的潮流一样，在中国，谁也阻碍不了新经济学的发展。

我经常对我的学生们说，经济学的学习主要不是靠记忆，而是靠思考。这并不是说记忆不重要，但记忆得再多，如果缺乏思考，那又有多大用处呢？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创新，不是来自“记忆”的多少。新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也不是多亏了“记忆”。在大学里流行一句话，教师在评论学生时，有时说：某某人属于“高分低能”类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高分低能”中“高分”可能是由于记忆得很多，甚至把教科书上的东西全背诵下来了。

“低能”则指不能联系实际，不能解决现实中的问题，不能在已经学到的基础上再前进一步。有些经济系学生的“低能”可能是由于缺少分析能力，缺少把知识用于实际的能力，缺少经济学的创新能力。这样的学生，是很可惜的。对此，教师应当负一定的责任。教师只要求学生记忆、背诵、复述，而不要求学生思考，尤其是不受教师本人讲课内容限制的独立思考，其结果必然造就一批“高分低能”型的学生，这不能不被认为是智力投资中的一项损失。

假定经济学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不进行较大改革，那我们所培养的“高分低能”型学生的人数就不会减少，经济学界的学

风、文风也不会有很大转变。“高分低能”型的学生，将来会加入到经济学教学、研究的队伍中来。他们也会写文章，但那样的文章说明不了实质性的问题，也提不出新的、能够发人深思的见解。今天，我们在经济学刊物上，还能读到一些由“百分之五十是带引号的别人说过的话，另外百分之五十是不带引号的别人说过的话”所组成的文章。当然，这类文章的数量比过去是少得多了。但这样的文章现在还能在某些刊物上发表，原因很简单，不是文章的质量，而是作者的名气。单凭这两、三个字，就足以使它们得以占据宝贵的刊物篇幅。很难设想这一类文章的作者当年不是“高分低能型”学生中的一员。难道我们还要继续培养类似的“高分低能型”经济学工作者吗？难道我们的经济学刊物还要继续刊登这些尽是重复别人说过的话而没有自己的看法的文章吗？

因此可以预言，今后在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中，一个显著的变化将会反映在经济学作品的文风的转变上。那些由或者是“带引号的别人说过的话”，或者是“不带引号的别人说过的话”拼凑起来的经济学论文，那些不联系实际的空空洞洞的大块文章，再也不会读者了，因为读者自己会认识到，读这样的文章是白白浪费时间。

还可以预言，今后，随着经济学研究中的新的突破，经济学工作者之中善于独立思考的人一定会越来越多。在他们的作品和言论中将不断地涌现出“思想的火花”。将来中国经济学研究队伍的质量究竟高不高，不是看别的，而是看经济学工作者是不是独立思考，思想上有没有“火花”。

六

经济生活与社会上每一个人有关。社会上每一个人都关心经济的兴衰，关心收入、价格、消费、福利、就业等等与自己切身利益有联系的经济问题，关心国家经济建设的前景和社会发展的前途。不管他们是不是以经济工作为专业，也不管他们是不是经济理论队伍中的一员，他们都有可能对经济前景感到兴趣，并且在认真思考这方面的问题的基础上，写成作品，提出新的观点。

从经济学说史上看，在经济学领域内作出成绩的，不一定是经济学的专业工作者。业余的经济学工作者和在其他专业从事研究而又对经济学感兴趣的人，都曾经参加到经济学的研究队伍中来。他们之中，有的是医生，有的是工程师，有的是商人，有的是政府官员，还有的是新闻记者，即使有些人曾在大学里教过书，但他们可能是教哲学的，教数学的，教物理的，教其它各种非经济学课程。这并不奇怪。要知道个人的专业兴趣可能是多方面的，也可能是有所转移的。本来不学习经济学的人，本来不从事经济工作和经济理论研究工作的人，后来可能对经济学感到了兴趣，决心研究经济问题，并为此投入了劳动。如果说历史上就有过不少非专业的经济学工作者成为有成就的经济学家的例证，那么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过程中，这样的例子不会较少，而只会更多，因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是十亿人民共同的事业。

能不能这样认为，中国经济学的前景既取决于广大专业经济学工作者的迅速成长，同时又取决于更多的非专业经济学工作者加入到经济学研究的队伍中来，并且同专业经济学工作者一起，为新经济学的发展而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未来的中国经济学研究队伍，必然包括这样两部分人，即专业经济学工作者和非专业经济学工作者。他们各有所长，他们共同合作，他们都是新经济学队伍中的成员。从这个意义上说，忽视非专业经济学工作者的研究及其成果是不对的，也是不利于经济学发展的。在这篇代序言的结尾，我准备表达这样一种心愿：希望专业经济学工作者鼓励、帮助非专业经济学工作者更深入地研究经济问题，以壮大我们的队伍，共同把经济学的研究提到更高的水平。我们要为他们参加经济学研究创造良好的学术环境。不要动不动就责怪这些同志“不务正业”。什么是正业呢？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出主意，提建议，想办法，正是每一个社会主义建设者的责任所在。我想，有志于建设中国新经济学的专业、非专业经济学工作者，是会同意我的这些看法的。

《中国现实经济丛书》编委会

主 编 马 洪 刘国光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列)

卫兴华	王岐山	王诚尧	王贵宸
王积业	王梦奎	陈一咨	张卓元
李京文	何建章	吴敬琏	周叔莲
赵人伟	殷 衷	戴园晨	

本书编撰人员名单

主 编：刘国光

编审组成员：刘国光 于祖尧 沈立人
戴园晨 何家成 边勇壮

写作组成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于祖尧 边勇壮 田江海
杜海燕 沈立人 何家成
林青松 赵人伟 戴园晨

责任编辑：华 飞